

新时期汉语语言 变异研究

● 曹 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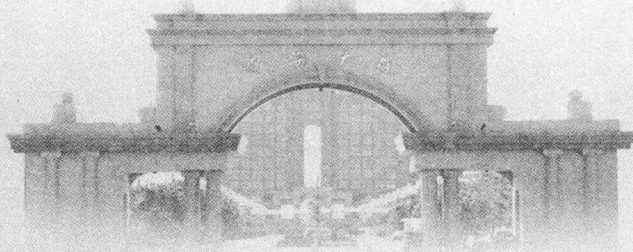
013029010

H11
23

● 2009年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团队项目 ()
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新时期汉语语言 变异研究

● 曹 起 著



北航

C163773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H11
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研究 / 曹起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502 - 2

I. ①新… II. ①曹… III. ①现代汉语 - 变异(语言) - 研究 IV. ①H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901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秦 艳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55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把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两大类。从索绪尔的观点来看，结构语言学属于内部语言学，只注重研究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研究语言本体，即语言自身的结构。外部语言学则是把语言与地理因素、社会因素等结合起来研究，试图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来研究语言，这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索绪尔还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主张“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而非言语。受此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倾向于把语言看作是同质系统，把与语言有联系的社会之类的因素都排除在语言以外的领域，认为它们不属于语言系统的研究范围。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问世，在结构主义重视研究语言内部同质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语言系统的异质性研究。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为代表的“变异学派”，提出了语言“有序异质”理论，主张语言研究应以语言变异为首要研究对象。

客观世界是无限的，有限的语言符号很难表达无限的外在世界，语言在反映丰富而复杂的客观世界时往往是不完备的。在日常交际中，我们使用的语言总是呈现出纷繁多变的表现形式。这些使用中的语言，随着社会因素的变化或语言自身因素的变化而产生的差异，就是语言变异。从语言的历时发展观察，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语言的发展中语言变异现象普遍存在，可以说，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的发展。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静止的、自足的、同质的符号系统，语言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不断产生变异，是一个动态的、不自足的、异质有序的符号系统。语言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语言变异和发展与社会的变化发展息息相关，相互影响，存在有规律的共变关系。社会发展变化影响语言变异；语言变

异反映社会发展变化。语言变异观认为语言是以多种变异形式存在的；语言变异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而是自然语言的普遍性特征；语言变异也不是随意的、杂乱无章的现象，而是具有“异质有序”的系统特性；语言变异在语言交际和语言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基于这种语言观，语言变异研究主要探讨语言变异与社会变异的共变关系及其规律、语言异质有序的系统结构以及语言变异的社会功能等多个方面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陈原等人引入社会语言学研究汉语，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为汉语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陈原（1988）认为“活着的语言能够不断地、连续地产生变异，这种变异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新生事物总是在不断涌现，而语言却无法以同等速度加以反映，这种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矛盾就不断促使语言系统的变异发展。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非常迅速，汉语语言变异现象层出不穷。语言变异在语言的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层面都可能发生。就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汉语的语言变异研究有两个方向，一是研究语言变项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如探讨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社会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一是从语言系统层面关注变异，主要研究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语言子系统要素的变异情况，探究实际运用中语言的变异形式、过程、原因和规律。曹起的《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研究》不是对具体的语言变项与社会的共变关系进行具体分析，而是侧重于描写新时期汉语语言系统的变异情况，并试图阐释产生这些变异现象的理据。

语言变异是在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产生的，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目前还未见有专著从语言变异角度对新时期汉语的发展变化作全方位的考察与分析。曹起的《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研究》可谓适逢其时。本书系统论述了新时期汉语在词汇、语义、语法等方面的变异形式、特点以及产生语言变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与规范化问题。作者在借鉴相关论著观点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发现。例如，对语义变异的研究一般关注“词义的变异”较多，而作者在本书中除了论述“词义的变异”外，还特别研究了新时期汉语语素义的变异。认为现代汉语虽然产生了大量的新词新语，但产生的新语素并不多；新语素主要表现为一些外来词音译成分的语素

化,少数新语素是汉语自生的;新时期产生的语素新义除了外来词语素化带来的新语素义外,另一个主要表现是新产生的合成词中语素义变异。这方面的研究对新词语词典的编撰以及汉语教学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语言学意义和社会应用前景。语言的发展演变离不开语言变异,对汉语语言变异进行研究,探讨汉语语言变异与汉语语言发展演变的关系,有助于科学地揭示汉语的发展规律。就语言应用来看,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研究为汉语辞书的编纂、汉语教学以及新时期汉语规范化提供依据。语言与社会存在共变关系,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思想文化的特点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观念心态。所以,对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的研究还具有社会文化意义。

当然,本书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对某些变异现象的分析还不够全面、深入。例如,本书比较重视对语言变异的形式、类别、原因的研究,但对语言变异的社会功能以及相关理论探讨还不够;对某些语法变异现象的研究虽然注重共时与历时结合考察,但在历时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有时浅尝辄止。书中不足可资语言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讨。我期待作者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

夏中华

2012年7月21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语言与变异	(1)
第二节 语言变异的界定	(2)
第三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价值	(4)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的内容及材料来源	(5)
第二章 新时期汉语词汇变异	(7)
第一节 新时期社会发展与词汇变异	(7)
第二节 关于新词语的界定	(8)
第三节 新时期汉语词汇形式变异	(15)
一、新造词	(16)
二、方言词	(19)
三、外来词	(22)
第四节 新时期汉语词汇形式变异特点	(34)
一、新词语音节有多音化趋势	(34)
二、缩略新词语大量产生	(40)
三、新词语中同族词增多	(44)
四、外来词有增多的趋势,并且字母词越来越多	(45)
第三章 新时期汉语语义变异	(47)
第一节 新时期汉语语义变异的研究对象	(47)
第二节 新时期汉语语素义的变异	(48)
一、语素义与词义的关系	(49)
二、新时期产生的语素新义	(52)
第三节 新时期汉语词义的变异	(65)
一、词义系统增加新义位	(65)

二、词义的偏移	(79)
第四节 新时期汉语语义变异的特点	(98)
一、义域分布广泛	(98)
二、单义新词占多数	(100)
三、新词词义产生的方式多样化	(101)
四、新词语的语义具有不稳定性或模糊性	(105)
第四章 新时期汉语的语法变异	(110)
第一节 汉语语法的发展变化与语法变异	(110)
一、聚合规则的发展	(110)
二、组合规则的发展	(111)
三、聚合与组合的相互关系	(112)
第二节 聚合变异	(115)
一、词性的游移	(115)
二、类词缀大量增加	(121)
第三节 组合变异	(126)
一、词语模类推构造新词语	(126)
二、新兴“副+名”结构	(129)
三、动宾式动词带宾语 ($VO_1 + O_2$ 结构)	(134)
四、新兴“被×”结构	(140)
五、“有+VP”结构	(149)
六、新兴的汉语重叠式	(156)
七、其他组合变异	(166)
第五章 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的动因	(168)
第一节 语言外部动因	(169)
一、社会的发展	(169)
二、语言接触	(171)
三、语用心理的变化	(176)
四、语言功能动因	(180)
第二节 语言内部原因	(186)
一、语言要素的相互制约	(186)
二、语言的类推机制	(189)

第六章 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与语言规范	(193)
第一节 语言变异与语言规范的关系	(193)
第二节 新时期汉语的语言规范研究	(194)
一、新时期汉语语言规范研究概况	(194)
二、新词语与语言规范	(196)
三、网络语言与语言规范	(209)
四、语法变异与语言规范	(214)
第三节 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与语言发展	(221)
一、语言变异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	(221)
二、语言变异增加了新的语言表达	(223)
结语	(225)
参考文献	(228)
致谢	(23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语言与变异

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可以说语言的变异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陈原所说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就是变异。变异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说，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的发展，也就没有社会语言学”^①。过去，中国的语言学家用静止的观点来看待语言问题，往往强调语言的规范性，而舍弃语言的变异性不谈。如果某种语言现象稍有“出轨”之处，就会加以指责，认为不合规范。当今时代社会发展非常迅速，语言变异现象层出不穷。大量新词、新语、新用法的出现，也是语言本身要求突破旧有的单调的表达形式，来反映社会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现象。汉语系统是一个有层次性的开放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有序的集合体，这种开放性和有序性相统一的组织状态，为语言变异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变异性”是语言的一个基本特性。美国人类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指出“人人都知道语言是变异的”。但是，在语言学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语言学家却都在回避语言变异现象，认为语言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从纷繁的语言材料中抽象出整齐划一的条条框框，因此，语言描写的成果基本排除了变异的内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变异性被认为是语言材料的一个负面的特征，语言学理论似乎只关心脱离了变异的语言结构的规律性，近年来，这种观点受到了挑战。许

^① 陈原：《变异与规范化》，《语文建设》1987年第4期。

多语言学家开始认识到,语言的变异特征也是语言的本质特征,语言学理论必须包括对语言变异的解释。^①

语言变异理论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任何自然语言的语言系统都是有序异质体,变化是语言的本质。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认为研究语言必须联系社会实际。语言变异既包括某个特定语言项目在共时分布上的差异,也包括该语言项目在历时流程中的变化。社会语言学家把语言放在社会环境中去研究,具体分析语言的各种变异。语言研究者可以通过变异成分的分析来考察变异同社会因素之间的共变关系。早在1979年陈原就采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新词语。他的专著《语言与社会生活》(1979)、《社会语言学》(1983)都对当时属于新词语的“文革词语”等语言变异现象从社会因素上进行了分析。他引进了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共变理论。“共变”论是美国布赖特提出来的,是社会语言学研究常用的新术语,所谓的“共变”是指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也随着社会生活发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语言作为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它作为特殊的社会现象,对社会有绝对的依附性;另一方面,它对社会的发展又有应变性。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新词语,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时代和新事物的发展,新词语则以灵活的方式来反映和服务社会,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从一个社会流行的新词语可以清晰地洞悉当时社会发展的脉络,这也就提示我们在研究语言时不能凌驾于当时的事件和时代特点之上而单纯地去谈语言,而是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准确理解它们的内涵。研究者们逐渐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新词语,用以揭示新词语背后决定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条件。可以说这种研究视角一直贯穿着整个新时期的新词语研究。

第二节 语言变异的界定

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对于变异的概念,国内外的语言研究者们都有自己的理解。

^① 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吴国华(2000):所谓变异,是指与规范之间的差异。

肖建安(2000):语言学借用这个生物学术语(变异),指同一种语言在一定时间和区间内在其运用上所产生的语言差异现象。

聂桂兰(2002):语言变异属于一种言语活动,指的是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对语言系统规则的偏离或变异。

朱学佳(2002):从宏观上讲,(语言变异)指一个语言地区,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使该语言地区的语言状况发生变化。从微观上讲,语言变异是指同一个内容,因为语言使用者场合、语境、话题、语言表达目的的不同等而引起的语言变异。

从上面各家对语言变异的理解可以看出,变异中产生的变体是与正体相对而言的,意味着变异有其变异的原式。但另有学者认为变异不一定都需有原式,语言中出现的新的要素都可以看成是语言变异。持这种观点的有:

陈原(1983):新词的出现是社会生活变化的结果。一般地说,语汇的变异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1)创造新词,例如,“团伙”、“生产责任制”、“攻关”;(2)旧词被赋予新义,例如,“朋友”(在一定场合下,指恋爱对象)、“爱人”(指丈夫或妻子);(3)原词压缩了语义(狭化),或转为特定的贬(褒)义,例如,“批判”(→“批评”)、“反省”(原义较宽,新义较窄);(4)外来语音译(或意译)新词,例如,“迪斯科”(disco = discotheque)、“雷达”(radar)、“诺浩”(know-how 又意译作“专有技术”)、“软件”(soft-ware)。

陈章太(2002):新词新语的产生,是新时期语言结构成分变异最主要的表现。

语言作为人们交流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在不断使用的过程中逐渐沉淀出一套系统的常规用法,形成了各种语言体系。但是事物是变化和发展的,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语言会产生各种非常规的使用形式,并在人们的不断使用中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普遍传播,最后变为常规用法。那些非常规的语言形式就被称为语言变异。拉波夫认为,语言变异的分类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常见的分类有语音变异、词汇变异、语法变异、语域变异、方言变异、历史时代变异、书写变异、语义变异等。

综合各家,我们将语言系统中新质要素的出现看做语言变异,对原语言系统规则的偏离或违反也是语言变异。新时期汉语中出现的新词新语以及超常规的用法等将是本书着重讨论的语言变异现象。我们主要从词汇、语义、语法等方面来探讨新时期汉语的语言变异现象及其动因,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一步探讨语言变异的规范问题。

第三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价值

语言的发展历史表明,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语言系统各要素都或多或少发生着变化,比较而言,其中词汇的变动最为剧烈,主要表现为新词(包括旧词新义)的产生以及旧词的隐退甚至消亡等。词汇系统的新陈代谢需要一个过程,刚出现的新词(包括旧词新义)一般要经过语言社团的使用、传播,而后那些被社会语言社团广泛接受的新词才有可能进入词汇系统。部分新词或产生新义的旧词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成为一定时期特定言语社团甚至全社会通用的流行词语。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有新词语的产生,尤其在社会和文化变革时期,新词语更是层出不穷。除词汇的变化外,语音、语义和语法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再加上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代汉语发展变化的速度前所未有。这些变化早已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注意,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从已发表的相关文章来看,多数是对新时期以来汉语新词语的研究。但对当代汉语语言变异作系统的研究较少。

语言变异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问世以后才受到重视的。以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为代表的“变异学派”,提出了语言“有序异质”理论,他们以语言变异为首要研究对象,发展了一整套调查言语社团、搜集语言素材以及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早期的变异研究多集中于口语的语音变异方面,目前已逐渐扩展到词汇、语法、语义、话语分析等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但大多数社会语言学家较多地注重变异成分与社会因素之间共变关系的分析,而对语言变异与语言结构系统关系以及认知理据的探求相对不足,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从对当代汉语变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汉语语言结构系统的某些发展和变化;同时,新产生的语言现象更为直接也更为敏锐地反映了当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观念心态,以及社会思想文化的特点与发展变化和创新。所以,对当代汉语语言变异的研究具有更为深刻而丰富的语言学和社会文化意义,对填补充实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理论很有价值。这些实践的要求和理论上的思考正是本论题提出的出发点。

我们在本书中要着重探讨的是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现象及产生变异的动因,并进一步探讨语言变异与语言规范问题。语言变异是在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产生的,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目前未见有著作从语言变异角度对新时期汉语的发展变化作全方位的考察与分析。对语言变异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社会应用前景。首先,有利于推动汉语语言学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同时,为汉语辞书的编纂提供选词依据;其次,语言的发展演变离不开语言变异,对语言变异进行研究,探讨语言变异与语言发展演变的关系,有助于科学地揭示语言的发展规律,认识语言的本质;再次,为语言规范化提供依据。语言变异是语言要素在特定的语境中的变异,它有健康、积极的成分,也有不健康、消极的成分,通过对语言变异形式及其诱因的探讨,帮助人们认识语言变异的特点,有助于引导人们正确使用现代汉语,促进语言规范化和标准化;最后,语言变异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汉语语言结构系统的某些发展和变化反映了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观念心态,以及社会思想文化的特点与发展变化和创新。所以,对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的研究具有更为深刻而丰富的语言学和社会文化意义,对填补充实现代汉语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理论很有价值。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的内容及材料来源

我们在本书中以新时期以来产生的新的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对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的类型、特点作初步的描写,并阐释其产生变异的诱因。我们在行文中不纠缠于词和语的区分,只要是语言系统中出现的新的要素成分,都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由于语言是个相对开放的系统,不大可

能作穷尽式的研究,因而,我们拟从一定的范围内对语言变异作定量和定性分析。语言的变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本书探讨的语言变异现象属于群体性的恒常变异,对个人的临时性的言语变异不作探讨。

从语言的历时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相比较而言,词汇的变化最快最大,语法有很强的稳定性,变化最慢最小。可就新时期的汉语实际情况来看,词汇的变动仍然是最大的,但语音与语法相比,语法上的变化要大得多,语音方面短期内未见有新的语音现象产生。新时期这几十年汉语语音系统没有产生新的元辅音因素以及新的音节结构,所以要谈这时期存在汉语语音变异的话,也只是在话语中出现的一些语流音变现象,离开了一定的语言环境,这种音变现象就不复存在。这种临时的话语中的语流音变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

社会语言学要研究的语言变异是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运用方式。因而,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的研究主要是研究语言变项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如探讨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社会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本课题不对具体的语言变项与社会的共变关系进行统计分析,我们重点描写相对于现存的汉语语言系统新时期汉语存在哪些变异现象,并试图找出这些变异现象产生的理据。

本书所用语料,有来自书刊报纸的,也有来自电子传媒的;有书面的,也有口头的。书中所用例句有的来自人民日报报系搜索;有的直接采用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中使用过的例句。涉及的新词语主要来自几本新词语词典。这几本新词语词典及收词数分别为:亢世勇、刘海润主编的《新词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收录1978—2002年新词近2万余条,周洪波《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2200多条,王均熙《新世纪汉语新词语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版)收2006年前新世纪初期新词语5000余条,侯敏、周荐《2007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2008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2009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三册共收词1173条。从时间跨度来看,几本词典的收词基本反映了近30年当代汉语新词语的概貌。本书中提到的“新时期”、“当代”都指的是1978年到当前这段时期。

第二章

新时期汉语词汇变异

第一节 新时期社会发展与词汇变异

新时期语言变异最主要的表现是新词语的产生。新时期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国家从封闭、沉寂走向开放、活跃,并向现代化、市场化、一体化大踏步迈进,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从语言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社会发展比较缓慢时,语言的发展也缓慢,而社会急剧变动时,语言的发展也随之迅速。新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新观念,汉语词汇随之不断地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的变革、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际关系的调整,等等,都能在语言的词汇中得到反映。社会发展进步越迅速,新词语的产生就越快越多。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信息传递的工具。罗常培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论述:“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①而在语言各要素中词汇受民族文化心理影响最直接,与文化联系是最密切的。凡是社会上出现了新的东西,不论是新制度、新体制、新措施、新思潮、新物质、新概念、新工具以及新动作,这些新的东西都一定会千方百计在语言中表现出来。词汇变动的具体表现就是新词、新语、新义不断涌现。王德春认为:“新词新义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产生新词新义的方式也很多,有构词、借词、仿造词、旧词

^① 罗常培:《中国人与中国文》,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1页。

复活、作家新语、派生新义、词类转换、词缀新义、潜在词，等等。”^①就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些新词、新语、新义的绝大多数都是《现代汉语词典》不曾收入的，有些词语《现代汉语词典》中虽有，但作为新词语的意义与《现汉》^②所解释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

新时期汉语词汇系统的变异最突出的表现是新质要素的增加。社会的发展变化所引起的语言变异，首先主要表现在词汇的发展变化上，而词汇的变化又主要体现在词汇的增损，即新词语的增加和旧词语的隐退两个方面。其中新词语的大量增加是词汇发展变化中最显著的部分。在新时期，新词语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词语的剧增引起了汉语词汇系统的明显变化。本章讨论的新词语，包括某些网络词语和流行语，因为它们都属于新时期汉语词汇的新质要素，当然应成为词汇变异的考察对象。

第二节 关于新词语的界定

任何语言单位都是由形式和意义两方面构成的，新时期汉语词汇的形式变异主要是指新时期汉语词汇系统新增益的词语，即新词语。

新词语，顾名思义，就是新产生的词语。新词语的产生，是各语言的普遍现象。广义的新词语，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都有一个爆炸的数字——十几万！即使狭义的新词语，即进入民族共同语的、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的，一种语言每年也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据巴恩哈特（Barnhart）统计，美国英语每年新增约800个，对此《韦氏新国际词典》的几次增补已经有所反映，仅《第三版补编》就收了1961—1976年的5000来个新词语。据巴黎国际法语委员会调查，1973—1979年产生了1万来个新词语。俄语50—60年代每年新增180个，70年代每年新增550个，80—90年代更多。汉语，近10年每年新增词语为300—400个。^③

① 王德春：《词汇学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20页。

② 本书中提到的《现汉》，如果没有特别注明，就是专指《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有时用全称，有时用简称。

③ 张志毅、张庆云：《新时期新词语的趋势与选择》，《语文建设》1997年第3期。